



辛亥革命全景录

主编 金冲及

国家“十二五”规划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重点图书项目

铁血破晓

——辛亥革命在贵州

何光渝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全景录 主编 金冲及

国家“十二五”规划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 重点图书项目

铁血破晓

——辛亥革命在贵州

何光渝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破晓 / 何光渝著. — 贵阳 :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221-09703-3

I. ①铁… II. ①何… III. ①辛亥革命—史料—贵州省 IV. ①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51817号

铁血破晓——辛亥革命在贵州

何光渝

贵州省博物馆 何光渝

曹维琼

程亦赤 谢丹华 龙建人

徐 晖 唐锡璋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550004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710mm×1000mm 1 / 16

250千字

20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1-09703-3

45.00元

图书发行电话: 0851-6828477 (贵阳) 010-57173070 (北京)

如图书有装订错误和缺页,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电话: 010-69575798)

总 序

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到现在整整 100 年了。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第一次历史性巨变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对辛亥革命是一个很高的评价，解决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问题。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是不够的，往往讲它的消极和失败的方面比较多，讲它的历史意义和对中国历史的推进作用比较少。这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时代的原因。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于 1941 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讲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当年的青年现在如果还在世的话已经九十来岁了。林伯渠同志 70 年前讲这番话的时候尚且如此，今天的青年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严重不够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代的原因也很重要：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改变。孙中山也总是强调“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所以在民主革命阶段，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先进人士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面，以鼓舞人们继续奋斗去夺取胜利。因此，以前对辛亥革命的不足方面讲得比较多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已经过了 100 年，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并且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回过头来看，我们自然可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作出更冷静、更全面、更客观的评价。

把辛亥革命看作是 20 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它的主要历史功绩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于辛亥革命的表述。但这句话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说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是说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上提出了新的目标。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到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中华民族在古代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但是到近代却大大落后了。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因为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丧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的完整主权和尊严，走上了听凭外国殖民者欺凌和摆布的半殖民地道路。此后，中华民族逐渐陷入苦难的深渊。当时，压在中国人心头的有两块巨石，一块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块是清政府的反动腐朽统治。

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此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亲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我们当时悲痛之深，实非言语所能表述。”可见甲午战争对中国人的震动和影响之大。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到此为止。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租胶州湾，自此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领土，划分势力范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世界上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后，八国联军占领中国的首都——北京长达一年之久，并实行分区管制，居民要分别悬挂占领国的国旗。这种耻辱，不能不深深刺痛中国人的心。90年后邓小平同志还谈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接下来的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沙俄为了争夺在华利益，在中国东北进行了一场日俄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朝两国历来唇齿相依，唇亡齿寒。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又给了中国人很大的刺激。中华民族已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

长期以来，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许多国人盲目自大、安于现状。

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但一般人的认识还很不足，危机意识不强。1894年甲午战争前夜，郑观应在其名著《盛世危言》中看到“时势又变，屏藩尽撤，强邻日逼”的严重局面，觉得需要危言耸听地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但是在书名中一定要加上“盛世”两字，不敢说已是“衰世”，不然受到的压力就太大了。1894年，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第二年，改良派的严复写了一篇《救亡决论》，最先喊出“救亡”的口号。陈天华在《警世钟》中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反映出当时中国人那种焦虑和急迫的心情。

我们再来看看清政府的状况。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流亡西安的清政府发出一道上谕，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此时的清政府已然成为一个“洋人的朝廷”。清政府还是一个极端专制的政府。在民怨沸腾、革命高潮日益逼近之际，清政府于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的第一条就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它还规定国家颁布法律、召开议会、调集军队、对外宣战、签订条约等权力都集中在君主手中，特别强调“宣战、讲和、订立条约及派遣使臣与认受使臣之权。国交之事，由君上亲裁，不付议院议决”。可见，即使已到了穷途末路，清政府依然坚持那种极端专制的制度。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大体在白银八千万两。而甲午战争失败后向日本的赔款就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加上分期缴付所需利息，相当于三年的全部财政收入。《辛丑条约》按照人均一两白银的标准，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四亿五千万两。这些钱从哪里来？一方面，清政府大量举借外债，这大大加深了对列强的依赖；另一方面，只能加重税收、加紧搜刮国民。至宣统三年，国家的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白银。当然，这不是生产发展而只能是加紧剥削的结果。

如何改变这样的危局？中国的出路在何方？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维新变法等许多尝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仅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而且组建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也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并且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所以，毛泽东同志说过：“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尽管孙中山的思想中有着空想的成分，并没有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但这些目标的提出毕竟激励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为之奋斗。辛亥革命

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历史重担。多少年来，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土地制度，而君主专制制度反过来又从政治上保障维护了封建土地制度。君主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就得要有“舍得一身剐”的勇气，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而辛亥革命砍掉了皇帝这个封建社会的“头”，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从此以后，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南京政府，像走马灯那样一个接一个登场，旧社会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政治秩序来。这样的状况和辛亥革命以前显然不同。

有人评价辛亥革命导致了军阀割据，社会更加混乱。似乎革命徒然造成社会的混乱，妨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目光短浅的看法。实际上，辛亥革命将清政府打倒后，旧势力只能靠赤裸裸的野蛮的军事统治，显然这是无法持久的。而且，军阀混战使旧统治势力四分五裂，也有利于以后人民革命的开展。所以尽管军阀混战对中国人民的伤害极大，但如果从稍长时段的历史眼光来看，这种动荡和阵痛是社会转型期常需经历的过程。可以说，辛亥革命在这方面正给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打开了道路。

三、辛亥革命带来了民主意识的高涨和思想的大解放

民主意识就是指国民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在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里，一切都是皇帝“乾纲独断”，老百姓根本谈不上有对国家建议和管理权力。戊戌变法前的“公车上书”当时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但上书的都是有功名的举人，并且由于都察院拒绝代递，所上之书也没有能送达朝廷。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特别提出要写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他最看重的一点。虽然中华民国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当家作主的现实，但民众的心理发生了很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民国成立后，各种政治团体纷纷成立，报纸杂志空前活跃，

群众活动多了。可以这样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因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创造的这种社会氛围和民众心理状态，五四运动很难发生。另一点是思想的解放，辛亥革命将过去被看得至高无上的皇帝推翻了，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能怀疑、不能推倒呢？陈独秀在《新青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奇出众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作元首。一旦亡了国……比寻常人还要可怜。”五四运动时期对许多旧事物的怀疑和批判，同辛亥革命带来的思想解放有很大关系。

从近代历史上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做了天王实际上还是皇帝；戊戌变法是想靠一个好皇帝来实现；义和团运动打的还是“扶清灭洋”的旗号。从世界范围来说，世界大国实行共和政体的只有美国和法国，其他的都不是共和政体。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共和政体，这件事不能小看。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严重的弱点和不足。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并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第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都没有足够的认识，许多人认为推翻清政府后革命就成功了，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第二，它没有广泛地发动并依靠群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大众。辛亥革命的主干力量是受过近代教育的爱国青年。他们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博得了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后能够迅速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它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了群众，所以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它并没有能依靠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在农村没有一个大变动。而没有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参加和支持，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就觉得自己势单力孤而易于妥协，这是它失败的重要根源。第三，同盟会是一个相当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内部就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把革命推向前进的坚强核心。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一个能提出科学的明确的革命纲领、能依靠和发动最大多数群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坚强有力的党。因此，尽管辛亥革命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但仍没有解决根本问题。这也促使许多投身过这场革命或受到它影响的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找新的出路。

走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和第三步。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

两个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兴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历史事件是一步一步走的。中国的近代史就好像接力跑一样，后来的人以前面跑到的地方作为起点，接棒，然后又远远地跑到前一个人的前面去。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10年的历史，是不断探索、不断在矛盾中前进的历史。它留下的经验教训，不仅使我们了解共产党建立的必然性，而且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启示。

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取得众所公认的突出成绩。但有一个问题仍是很值得注意的：中国版图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多样。各个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风俗习尚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它的发展在各个地区并不是以同一模式再演。共同性和差异性同时存在，这在研究中国各个时期历史时都需要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是如此。如果目光只集中在少数最引人注目的地区，很容易有简单化的缺陷，不足以完整地表现出这场革命的全貌，也难以看清这场革命在整个中国造成怎样的历史性巨大变化。

分省研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比较。这部丛书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区。中国各地的情况复杂多样，丛书各卷分别对这些省在辛亥革命前的社会状况、哪些社会力量发动了当地的革命、清朝疆吏是如何应对的、革命引起了哪些巨大的社会变化、旧社会势力怎样反扑等等，都有相当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就便于进行比较研究：从相同的地方可以加深对这场革命共同规律的理解，从不同的地方又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的不同特点，这就是中国的实际国情。不作这种比较，既难更深入地把握住这场革命的发展规律，也难以看到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所以，这项工作对推进辛亥革命研究走向深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期待着的。

但是，要进行这样全国性的大协作谈何容易。我很钦佩人民出版社和各省人民出版社有这样的眼光，下决心齐心协力来从事这项巨大工程。由人民出版社和17家地方人民出版社共同策划并组织出版的这套《辛亥革命全景录》丛书，在新闻出版总署支持下，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其中，《共和大业——聚焦1911年》作为综合卷，总述辛亥革命的全过程；地方卷几乎每省一册（《直隶惊雷——辛亥革命在京津冀》包括了今天的两市一省）。这样，便全方位地概述了辛亥革命在各地的发展（可惜缺少了新疆、广西、福建和东北）。

承担了这项任务的出版社都把这项工作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各社社长担任丛书的编委会委员，亲自抓，称为“社长工程”。编委会先后召开三次编辑工作会议，确定：作为历史性纪实丛书，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不得虚构；图文并茂，注意可读性；还制订了丛书的装帧设计方案和印刷技术标准等。

丛书作者都是年富力强、学有专长的本地学者。书稿重点突出地方特色，对辛亥革命中的全局性活动及跨界活动，不写或只作简单的交代。由本地学者写本地事件，有许多优点：史料搜集相对较易，除充分使用现存的文字资料外，作者还亲历有关历史遗迹，走访当事人及其后代，收集整理了不少口述史料，经认真考证后使用，使本书提供了较多新的资料。为了做到图文并茂，责任编辑协助作者查阅大量档案资料，找到不少以往鲜为人知的珍贵历史图片，为丛书增色不少。

总之，这是一部集体努力的产物，必须归功于人民出版社、各省人民出版社和当地专家学者。我所做的工作很少很少，由出版社邀约而承担了主编的名义，主要是表示对这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支持和能够顺利完成的兴奋。我很希望各界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这部丛书的成果，并且指出它的不足之处，以便把辛亥革命研究更有力地推向前进！

金冲及

目 录

序章一	不能不说的人 / 1
序章二	不能不说的事 / 25
第一章	大厦将倾 道亦可变 / 43
	吴嘉瑞创办“仁学会”
	“科学会”起义流产
	陆军小学的“历史研究会”
	张百麟与“自治学社”
第二章	自治宪政 孰是孰非 / 77
	士绅们的“宪政预备会”
	周培艺草拟“请愿书”
	钟昌祚苦心经营“社会事业”
	谘议局中的职权角逐
	打不完的笔墨“官司”
	相抗争于议员席位
	殊死战于教育总会
第三章	阴谋阳谋 暮鼓晨钟 / 105
	立宪，还是革命？
	国民捐会，知己者莫如对手

“抢米风潮”如警钟
走出贵州，“嚶鸣求友”
运动新军乃第一要务
川路风潮飚发，革命风动贵州

第四章 风云诡譎 刀剑出鞘 / 127

抚台频频出招
紧锣密鼓筹划起义
这边忙计划，那边忙告密
黄德铨游说沈瑜庆
眼看多省独立，只好浑水摸鱼
真假“尔毋我诈，我毋尔虞”
“自保会”的阴谋

第五章 兵不血刃 黔省易帜 / 149

陆小事机泄露，没有子弹也要“兵变”
杨树青朝天一枪，沈巡抚交出大印
“反正”成功，全省遍插“汉”字旗
合作第一幕
大汉贵州军政府与众不同
刘显世应召，“徒手兵”入省

第六章 泉未化鸠 变生肘腋 / 181

张泽钧直言谏
兴利除弊，初现新气象
“宽大主义”，矛盾百出
索赏、闹饷、暗斗
援川、北伐、出巡
选国民代表，曝群小阴谋

第七章 “二二”政变 喋血以争 / 205

“公口”林立，满街皆是“英雄结”

新编、漏编巡防营闹事

“耆老会”现身，频效秦庭哭

放胆密谋，罗魁作乱

“吾辈死无所，百麟真书生

黄泽霖死难，张百麟出逃

第八章 拼项上头 溅心中血 / 229

假涂灭虢，滇军入黔

钟昌祚赴昆，舍命阻滇军

赵德全漫不设防，唐继尧兵临城下

滇军开杀戒，螺蛳山麓“万人坑”

唐继尧督黔，“共和梦”一枕黄粱

黔省血流成河

第九章 泪眼看云 冤愤何申 / 257

北伐黔军，回家无门

洪江调停无果，政府朝令夕改

与其束手死，不如血战死

黔军回黔，大战松、铜

揭露黔变真相，书生愤起“驱唐”

“黔人冤愤团”，有冤何处申

尾 声 / 289

后 记 / 296

附 录 / 299

1. 本书所涉主要人物简录 / 300
2. 贵州辛亥革命要事简录（1894年～1913年） / 302
3. 主要参考引用文献书目 / 305

Xuzhangyi

序章一 不能不说的人

Bunengbushuoderen



历史有许多偶然，偶然之中却隐匿着必然。

历史有许多拐点，拐点之前总暗藏着机缘。

如果没有戊戌的启蒙，或许就不会有后来辛丑的新政。

如果没有辛丑之后的新政，或许就不会有后来辛亥的革命风暴。

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一切正如我们后来所见的这个样子，发生了……

在那个著名的辛亥年之前22年的一天，一位57岁的贵州人，与一位17岁的广东人不期而遇。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样一次偶然的机缘，此后的历史将会怎样？或许，戊戌年间的变法维新就不会发生；或许，它还是会以某种形式、在某个时间发生，变成现实，但很可能就不是已经发生过的那个样子。

光绪十五年（1889）秋八月，己丑恩科，广东乡试。考生云集，学子蚁聚。

这一年，主考官是李端棻，贵州人，内阁学士；副主考官是王仁堪，福建人，翰林院编修。这两人都是“严义利之分”、以经世匡时为己任的“清流派”中的著名人物。

开考之日一大早，考生们一起静候在广州城东南的贡院前。贡院东西，各有两个高大的牌坊，分别为“明经取士”与“为国求贤”。

寅时正点，考生们提着考篮，从大门的中、左、右三门进入贡院。经过搜检后，领卷依照号数入闱，各自进入就试的号舍。考试共分三场，每场考三天。头场考八股文二篇，试帖诗一首；第二场考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考策问五道。

按惯例，各省乡试由主考官出题。广东这年的乡试，李端棻给出的

考题是：（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二）“来百工则财用足”；（三）“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四）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这次乡试虽然仍沿袭科举旧制，还是“用典”，但主考官李端棻所出的考题中，已经有了些许变化，典出于《孟子》的“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就隐含着“经世致用”，即欲求国家富强，必须兴工理财之意，颇有策论的内蕴。

这时的李端棻，正打算通过他主持的乡试，注入新的内容，以图试行对科举的变革。李端棻自1863年入翰林院，从事学政多年，深知科举的弊害，正所谓“帖括词章误此生”。此举虽是“投石探路”，冒着一定的风险，但他更希望能够藉此识拔人才，真正“为国求贤”。

乡试放榜在九月中旬。按例，于乡试放榜次日，设“鹿鸣宴”宴请新科举人和内外帘官等。虽然仅清酒一尊，但对于新科举子来说，却是极大的荣宠。因为在鹿鸣宴上，他们要谒见主考官，注弟子籍。

来自距省城广州百余里、十分闭塞的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的17岁少年梁启超，此次秋闱折桂，榜列前第八名。自幼苦读，终于赢得一份功名，总是遂了“且耕且读”寒儒之家父母的心愿。

梁启超满心欢喜，心存感激。他与同科举子们一起，恭敬地拜谒恩师，向主考官李端棻行弟子礼。

但是，少年梁启超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他无法想象！

不几日，副主考王仁堪召见梁启超，竟然十分庄重地对他说，主座李端棻李大人对梁君的才学十分欣赏，特意请他代为做媒，把自己年轻的堂妹嫁给他。

主座大人招亲，副座大人做媒，这真应了“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训。



李端棻

原来，李端棻在批阅诸生考卷时，其中一份令他惊诧莫名。眼前这份答卷，在应对“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时，竟然独辟蹊径，用新颖的笔法写就，破题头两句即写道：“明莫明于千里镜，巧莫巧过火轮船”，把近代西方文明的两个重要标志，写进了刻板的八股文中！再一查问，发现此子竟是一17岁少年！如此年少，竟有这般学问，这等见识！李端棻认为，此人乃“国土无双”，将来必堪大用，是为栋梁之材，于是亲取为举人第八名。召见言谈中，又发现梁启超胸怀四方之志，忧国忧民，李端棻更深爱其才。这才产生了联姻之意。

梁启超受宠若惊，他无法拒绝这门婚事，只能深深感谢主考官的厚意和栽培。当梁启超手捧省布政司颁发的“文魁”匾额，乘舟回到家乡茶坑村时，整个乡里都惊动了。梁家满门更是沉浸在无限欢乐之中。但是，关于婚事，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却很不安，以寒素之家“齐大非吾偶也”为辞，表示不敢高攀。李端棻便差人转告梁莲涧：“我固知启超寒士，但此子终非池中物，飞黄腾达，直指顾间。我只管物色人才，勿以贫富介。且我知我女弟固深明大义者，故敢为之主婚。毋却也！”

光绪十六年（1890），梁启超赴京会试，与李端棻兄妹见面；但“是科不第”，仍返回广州。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19岁的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来到北京。在李端棻的操持下，梁启超与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完婚。

李蕙仙是李端棻叔父李朝仪的女儿。光绪七年（1881），任顺天府尹的李朝仪病逝于任上。李端棻幼年丧父，长大后从贵阳北上京师，在叔父严格的督促下，学业精进，常说“吾一生为人之道得之吾叔”。李端棻在说服叔母得到允诺后，遂以兄代父做主，成就了这份姻缘。

这份姻缘，改变了梁启超的一生。或可以说，如果没有李端棻的慧眼识拔，就没有日后叱咤风云的梁启超；一部中国近代史，或许就会因之而改写。

梁启超初到北京，言语不通，一口地道的广东新会话，让异乡人不知所云，无法与人交流。比他年长4岁的李蕙仙教他学习京腔，帮助他逐渐消除语言上的障碍。梁启超曾在信中写道：“我因蕙仙得谙习官话，遂以驰骋全国。”不过，梁启超的官话水平未必如他自己所说。后来，在百日维新时，